

【谈古论今】

无念不在国家

喻迎昉 蔡旭

在无锡的东蠡湖北岸、蠡湖大桥东侧，有一弯灵秀的曲堤。堤上植满柳树与桃树，堤前筑有形似圆月的石台，堤外是浩瀚辽阔的蠡湖，堤内有座明亮通透的小楼，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可楼。

这是晚明思想家高攀龙辞官归乡后所建造的隐居读书之所，因其让慕山乐水的他深感可意，故得名“可楼”。

高攀龙万历十年（1582年）中举人，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任行人司行人。行人司是礼部下设机构，据《明史》记载，设司正一人，为正七品官，行人三十七人，为正八品官，“职专捧节、奉使之事”。高攀龙在任上因正直敢言而被贬为广东揭阳县典史。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高攀龙因事归乡，直到天启元年（1621年）复出，历任光禄寺丞、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御史等职。他在无锡的二十六年间著书讲学，并协助顾宪成恢复东林书院，实践自己“始志于学”的初心。

高攀龙一生投入大量时间读书、讲学与著述，使得他成为晚明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于学术和政事，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高子遗书》有云：“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古代士大夫的身份与官员的身份常常是合二为一的，高攀龙认为学术是君子守道的工具，唯有学术正才能心术正，将此心用于施政，必能留下为人称赞的美政、善政。

高攀龙为官不忘致学，前往揭阳就任的船上就给自己定下了严规，务必静心以涵养德性，不被外界干扰。当时的揭阳，不仅因为旱灾洪涝交错导致饿殍遍野、民生凋敝，倭寇与盗贼的劫掠也异常猖獗，城乡居民家徒四壁，儿童青年缺乏教育。面对这座饱受天灾人祸的古邑，高攀龙一方面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一方面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夜间还要编纂刊刻教材。

如此功绩，使得他在揭阳驻留时间虽不久，仍然成为揭阳历代众多典史中唯一一位被供奉于名宦祠者，人们还把他居住过的一带称为“攀龙坊”，作为永久纪念。

高攀龙能把读书讲学与百姓社稷联系起来，因为在他心里，“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当初在揭阳的政绩印证了这一点，后来无论在野还是在朝，高攀龙所写的一系列上疏或文章，从救济穷民、改良荒政、恤商惠民等不同方面，展现了自己对民生与国事的深刻思考，他从来不是只在书斋问学的学者。在古代慈善史上，高攀龙亦有值得提及的一笔，他发起成立了无锡最早的、面向广大贫民的民间慈善组织——同善会。

高攀龙作为一个学者，十分强调学



高攀龙塑像 资料图片

习的重要性，他推崇的主要学习方法就是多读书，以读书明事理。他说：“书是古人所经历，欲后人享现成，昧者以之明，疑者以之决，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和，残者以之宽，局者以之宏，竞者以之恬，贪者以之廉，漫者以之庄，怯者以之公，惰者以之励，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药。”

而读书不能是死读书、读死书。高攀龙主张“一面思索体认，一面反躬实践”。在《东林书院志》收录的《高景逸先生东林论语》中，高攀龙反复强调，“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也”，又云“学问须要身体力行才得，不然只是空口说空话”。

因为坚信读书可以昭明事理、开阔心量，高攀龙在为子弟编写的家训中，第三条即写道：“吾儒学问，主于经世，故圣贤教人，莫先穷理……穷理虽多方，要在读书亲贤”，更将朱熹的

“为善最乐，读书便佳”手书给儿子、孙子。

“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风之爽，可以负日之暄，可以冥月之来而饯其往……于是名之曰可楼，谓吾意之所可也。”而今，当我们重温高攀龙“忧国、亲民、实学”的思想，再读《可楼记》，不由对其洞见更多了一份钦佩。

“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无所不可焉，斯无所不足矣，斯无所不乐矣。”仁智者，好学乐学，以学修德，静养性，学以致用。

今天的可楼前，每到夏日，荷叶田田，菡萏秀立，仿佛还在应和着正读书的高攀龙，为这一方水土扬善风、固书香。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史海钩沉】

我国最早的旅行社“出身银行”？

阎泽川

一百多年前，在我国还没有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旅游机构。当时，我国的旅游业仅被少数洋商所垄断。在上海登陆的有英国的通济隆（Travel-ex）旅行社和美国的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日本的国际观光局也打入我国的沿海城市，设立代办机构。他们的服务对象只限于外国人和白领华人。甚至连介绍中国名胜古迹的导游也是外国人。

当时，曾留学美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注重引进西方银行管理科学，开拓新的银行业务。经筹划，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于1923年8月在总行成立，负责办理旅游业务，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旅行社。

旅行部开始仅代售沪宁与沪杭甬两路车票，后扩展为代办京绥、京浦、京汉等各路车票和长江、南北洋及外轮公司的客票，并在外埠分行加设分部。1924年1月，旅行业务逐渐发展，旅行部从行内迁出，在四川路420号营业。同年5月1日，开始发行国内旅行支票。1927年6月，上海商

业储蓄银行将旅行部从银行划出，作为银行附属事业独立经营，正式成立了中国旅行社。他们以“顾客至上，服务社会”为宗旨，确立了“发扬国光，服务行旅，阐扬名胜，改进食宿，致力货运，推进文化”的二十四字方针，开始了旅行社的创业之路。经向国民政府交通部注册、核准，于1928年1月领到中国的第1号旅游业执照。

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中旅社已经在西安、广州等处设立了56所分支社及办事处，并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了分社，成为中国近代旅游业的一个标杆。它的业务包括代售国内外轮船、火车、飞机票，设办旅游胜地的招待所，举办游览事业，每年春秋佳日，布置游程，招揽游客，还承办货物运输，接办各国银行发售的旅行支票，出版旅游杂志、培养专业导游等等。全国各旅游胜地都有中国旅行社的业务活动。中国旅行社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是因为它本着“费用务求减省，食宿必谋舒适”的宗旨，服务周到、热情。1929年8月，《申报》曾有记载：“今夏西湖博览会开亘古未有之盛会，四方人士云集，（中国）旅行社在门首择一席

地，为群众谋便利，竭诚招待，游湖中外士女咸感宾至如归，称誉之至。”旅行社的信誉和服务确是它的生命所在。

为普及国人旅游知识，宣传各地名胜，中国旅行社还出版了有关旅游的书刊。1927年春《旅行杂志》创刊，创办人陈光甫、朱成章。杂志由庄铸九总负责，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主编务，画家张振宇负责美术。该刊以提倡旅游、服务旅游为宗旨，刊稿多为介绍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的游记、随笔、诗词、图片等。而铁路建设、沿线风光、火车时刻表、客运常识等内容，几乎每期必不可少，由于图文并茂，实用性也很强，故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曾享有“铁路旅途之伴侣”的赞誉。

《旅行杂志》每年12期为一卷，每月以号标示。该刊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撰稿人大都是民国时期享誉文坛的新闻界、小说界乃至政界的重要人物。文章内容多以旅游散文、随笔为主，文笔隽永，可读性很强，并且配发的图片全为铜版印制，非常清晰。如第九卷第一号，刊有征文稿20篇，包括新闻记者郭步陶的《民众诗人洪玉亭之回忆》、郁达夫的《青岛济南

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张恨水的《滕王阁渺不可寻》、秦瘦鸥的《三次最愉快的杭州之游》等。又如1936年1月出版的第十卷第一期，内容量是正常刊物的一倍，刊物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刊登了“十周年纪念征文专辑”，共刊登了45篇文章，作者中有罗家伦、张恨水、赵景深、于右任、胡愈之、周瘦鸥等名家。他们都从各自多年的旅游经历和角度来反映旅游所带来的快乐和思味。

杂志初为季刊，季末出版，每卷共出四期。从1929年第3卷起，改为月刊，月初出版，每卷共出12期。抗战期间，杂志迁往桂林出版，1944年又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再迁回上海复刊。一直出版发行到1954年8月在北京停刊。

1932年，为了方便学生留美，中旅社出版了《游美手续提要》，同年还出版了该社最早的旅游书籍《旅川须知》。1933年，为了吸引海外游客，中旅社还专门邀请美籍著名记者埃德·斯诺撰写了5本英文小册子，分别介绍我国风景名胜，这些小册子随后被寄往海外各机关和交通运输公司，总数多达20万份。

（摘自《北京青年报》）